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社会周报】

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s）、克罗地亚革命运动
（Ustashe）和陈腐谎言

Ivica Bakota

（2019年3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s）、克罗地亚革命运动（Ustashe）和陈腐谎言

陈词滥调的谎言

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陈词滥调的谎言的主要问题并非在于重复多少遍会变成真理。至少不会对所有人均是如此，也不会一蹴而就。在世界上散布公然的谎言，总会有人将其视为对常识的公然侮辱。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民众对谎言不给予足够关注并任由它传播，不攻自破的“荒谬谎言”就会大量泛滥，而人们对这些谎言的反应就会变得无关紧要。当谎言破坏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真伪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时，我们就会屈服于对谎言的恐惧。

3月10日，Ravna gora Chetnik 运动(以二战后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的发源地命名)的成员在波黑东南部城市维谢格拉德(Visegrad)组织了一次集会。据报道，大约200名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成员和支持者聚集在一起，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逮捕的塞族将军和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领导人德拉戈尔朱布·德拉扎·米哈洛维奇(Dragoljub Draza Mihailovic)。许多前来的成员和支持者都穿着南斯拉夫祖国军的制服，而这种制服也在最近的波斯尼亚战争中被波黑塞族民兵和志愿者使用。在集会上反复呼喊的口号，让人想起南斯拉夫祖国军在战争中犯下的暴行。在宗教纪念仪式之前的讲话中，德拉扎·米哈洛维奇被形容为“为塞尔维亚民族的自由献出生命——不仅是为了塞尔维亚，更是为了民主发展、保卫家园的反对法西斯、反对乌斯塔沙(Ustashe)屠杀(二战期间克罗地亚法西斯运动)的南部国防军指挥官”。媒体报道说，“塞族家园”(Srpska Homeland)的拉夫纳戈拉运动的主席杜桑·斯拉多耶维奇(Dusan Sladojevic)(维谢格拉德集会的组织者之一)发表了谬误和谎话连篇的观点。谎言是如此的赤裸裸，乃至高中生也会放弃为米哈洛维奇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辩护。主流史学提供的事实证明，他毫无疑问是纳粹的合作者和机会主义战争道路的开拓者。在同样的意义上，有理性的人不会认为他“不仅为塞尔维亚国家”而战，也不会认为他没有与乌斯塔沙合作，而几

乎都会把他视为主要敌人。

然而，在这个特别的事件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竟变成了一个合法的谎言。不是真理，而是使谎言成为正当合理。朴实无华的态度(对一群匿名支持者的演讲)和荒唐可笑的辩论(明显的事实错误——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指挥官，以及现代政治话语的变体——为民主发展而战》，只会让一个“正当合理”的谎言变得更加平庸。

维谢格拉德集会之后，所有相关媒体和政界人士都谴责了这个事件。然而，对于这个公然的谎言为什么重要，对谁重要，却没有一致的看法。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去评论拉夫纳戈拉(Ravna gora)运动的复兴究竟试图用什么来取代真相。正如一些媒体多年来报道的那样，这场“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s)”的集会是在相对不公开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直至今日，公众才呼吁相关机构做出反应”。

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对“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s)”游行做出了反应。克罗地亚政治家大多感到震惊，塞尔维亚人的看法则存在较大分歧。英国和美国大使同日发出“严正声明”，批评此次集会。萨拉热窝市政府要求波黑检察署指控Ravna gora运动组织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活动。战争受害者组织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了这一事件。巴基拉·哈塞奇(Bakira Hasecic)在女性战争受害者面前指责波黑、国际社会允许在公共场合展示南斯拉夫祖国军制服，因为那些身穿这种制服的人曾犯下滔天罪行。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妇女、维谢格拉德(Visegrad)伊斯兰社区以及民主阵线等一些政党，都要求当局调查这个组织是如何登记为合法民间组织的。

谎言变得正当合理

很快，一场学术辩论在维谢格拉德开始了。学者警告说，维谢格拉德集会是政治氛围的产物，这种政治氛围“允许、甚至欢迎”南斯拉夫祖国军和其他民族主义者的集会。萨拉热窝大学教授恩维尔·卡扎兹(Enver Kazaz)认为，波黑目前存在的三种主要民族主义(由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战略是恢复法西斯运

动、价值及使其“道德正常化”。“维谢格拉德的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后果。”耶鲁大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法西斯主义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与他们的政治》,专栏作家凯末尔(Kemal Kurspahic)写道,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复兴光荣的过去并允许修正主义发挥作用时采用法西斯战术反对来自全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世界主义者阵营的各种挑战。不难想象,这些和类似的运动与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不分族裔。宗教领袖曾多次充当这种策略的代理人,要么为他们各自的种族群体(通常在1945年和/或1995年之后)清楚地描绘“黑暗时代”,要么为该群体宣讲世界末日。红衣主教(克族)温科·普利季奇(Vinko Puljic)不断直言不讳地批评渗入克族代表内部的“反克族”势力。(特别是在科姆希奇于2018年10月当选波黑克族主席团成员之后)据报道,波什尼亚克族宗教领袖支持民主行动党(SDA)意识形态的“真正”起源,即基于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Alija Izetbegovic)的理念。塞族神职人员宣布支持能够“像过去一样”保持塞尔维亚人团结的领导人。这三个族裔和各自的政党都支持基于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英雄和敌人的特定想象的意识形态,并改写了历史以适应这些争辩性的叙述。其中一些包括有明显错误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例子。这些例子几乎没有历史依据,不过是为了挑衅“对方”,因而没有什么合法性。

战争结束后施行的“法西斯地名学”提供的大量例子表明,这些不过是写任意编纂的公然谎言。每个族裔都曾在街道、广场或建筑物“试用”过这些名字。米哈伊洛维奇(Draza Mihailovic)与其他几个民间组织以及塞族共和国的东萨拉热窝(Istocno Sarajevo)的一个足球场同名。波黑克族人也有以有争议的乌斯塔沙和被描述为爱国者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二战期间的德国傀儡国)领导人命名的情况。在莫斯塔尔(Mostar)和希罗基比里耶格(Siroki Brijeg),有一些街道是以乌斯塔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米尔·布达克(Mile Budak)的名字命名。莫斯塔尔的“朱尔·弗朗西蒂克”街(Jure Francetic)则是以“黑军团”(Crna legja)的一个指挥官(对杀害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负有直接责任)的名字命名。波什尼亚克人也有用纳粹合作者的名字命名街道、学校和协会的例子。这种趋势在塞族共和国更是被特别“提倡”,每个城镇都有以某些在

克族人或波什尼亚克族人看来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排他的分类学在塞族共和国当局发起的一场要求在塞族共和国所有城市名称中去掉前缀的“波斯尼亚（Bosnian）”运动中达到高潮。直至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作出反应之后，才在以前的“波斯尼亚”城市前加上一些既不是波斯尼亚也不是塞尔维亚的不偏激的名字。

其他例子包括不同族裔社区的语言和教育政策。作为高度分散的国家，实体和联邦机构负责教育、语言和文化政策，这些政策不仅不协调，而且往往相互排斥。例如，克族占多数地区的机构曾在一段时期内试图恢复图季曼（Tudjman）时代在克罗地亚“流行”的语言纯粹主义政策。塞族共和国大力推行“西里尔字母”（Cyrillization）、改造奥斯曼帝国时期使用的词汇，以及使波什尼亚克族发明波斯尼亚语，都与来自三个不同族裔的民族主义政党采用的“法西斯主义”战略相一致。这种情况在文化史上更为显著，“波斯尼亚”的标签只用于那些难以将其身份归入族裔类别的艺术家、作家和其他历史人物（例如诺贝尔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克）。其余的“民族英雄和文化巨人”通常被隔绝在几乎不可分割、但平行的文化背景中。隐蔽的文化分类可以促进各种历史修正主义，从而很容易被编造成正当合理的谎言，并成为学校课程或文化项目的一部分。塞尔维亚学生从他们的克罗地亚或波什尼亚克同学那里了解到关于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波斯尼亚战争、乌斯塔沙和南斯拉夫祖国军运动的不同“真相”。这一事实是长期政策的必然结果，导致人民无法系统了解其他族裔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课程中可能出现的公然谎言是无意忽视和无关紧要的，但前提是它们只限于种族范围内，正如同维谢格拉德的南斯拉夫祖国军游行多年来一直不对外公开。因为在这个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注意那些业余南斯拉夫祖国军的胡言乱语。然而，使这些陈腐的谎言重新成为公然谎言的是平庸，通过平庸，谎言可以在波黑获得合法性。

（作者：Ivica Bakota 翻译：刘梓绚；校对：贺之杲；审核：刘
绯）